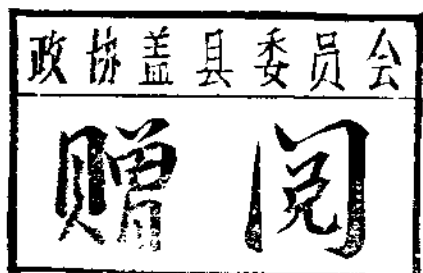


12812
05

东北青年的怒吼

(张英将军革命回忆录)



政协盖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写在前面

数十年戎马倥偬，今已解甲休息。回忆往事，仍历历在目，尽管我走的路是崎岖的，也是艰险的，但我既认准了目标，就奋不顾身、百折不挠、坚定地走下去。虽然征途中有欢笑、有痛苦、有斗争、有激情、有成功、也有失败，但路总算走过来了。抚今追昔，有经验、也有教训，经验和教训是可贵的。作为借鉴，写将出来，也许有所补益。

不过，自知知识有限，差错是难免的，请多加指教。

回忆录我将坚持写下去，愿以“明知夕阳时光短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自勉。

张 英

1988年10月

目 录

难忘的“九·一八”至“七·七”

- 1、不做亡国奴……………1—14
- 2、入东北中学……………14—25
- 3、张学良将军训话前后……………25—40
- 4、迁校鸡公山……………40—53
- 5、张学良将军对学潮的态度……………53—57
- 6、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……………57—69
- 7、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……………69—80
- 8、芦沟桥枪声唤我们赴疆场……………80—91

在八路军学兵队

- 1、参加了真正的抗日军队……………91—94
- 2、回忆我们队的两名学员……………94—95
- 3、学兵队的领导和教员……………95—98
- 4、学兵队的军事演习……………98—100
- 5、去八路军随营学校参观学习……………100—102
- 6、观赏战地服务团演出……………102—103
- 7、听红军老炊事班长讲故事……………103—105
- 8、一篇墙报一次支部大会……………105—106

- 9、同一二〇师战地考察团联欢.....108—108
- 10、庆祝八路军炮兵团成立大会.....108—109

难忘的“九·一八”至“七·七”

1. 不做亡国奴

我出生于辽宁省盖县一个农民家庭，家住在熊岳镇东边8里的红旗堡村。父亲和哥哥都是本分的庄稼汉。我的老祖母鲍氏十分疼爱我，在我童年时候，她常常向我讲故事。最有趣的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见闻。至今已过去60多年了，回味起来，老祖母讲故事的音容表情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这不仅仅是由于故事的魅力，而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讲故事，在我的幼小心灵中灌输了不做亡国奴的思想，这是最有意义的、使我终身难忘的事。

在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，我的老祖母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。谈起这些往事来，她讲得津津有味，有时甚至愤愤地不平起来。

她说：“反大鼻子、小鼻子那个年月，真叫人生气。大鼻子是愤国人，小鼻子是日本人。他们打起仗来了，可是两国交兵不在俄国打，也不在日本打，偏偏要在中国辽南这块地方打。他们可把辽南的老百姓坑害苦了！大鼻子，小鼻子糟踏庄稼，抢老百姓的东西，污辱妇女，搅得家家鸡犬不宁。他们急红了眼就大开杀戒。听说日本鬼子攻战旅顺口时杀了几万老百姓，只有几个人逃出来”。

鲍说：“日俄开火后，我和你爷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担心洋鬼子进村，有时一天惊几回。在家里呆不住

了，就跟乡亲们一块逃难。把家里能用的破烂东西收拾收拾，放到担筐里。一有情况你爷爷就挑起担筐，我带上你爹，就一块往东山沟跑。你爹那时候还小，我拉着他逃难，他很听我的话。”

“有一次，黄昏时分，村西头的乡亲们挽着老的拉着小的，成群结队地向村东头一股脑地跑来。我想准是出了情况。我赶紧把鸡、鸭、猪、狗关到窝里。我算计着：大鼻子、小鼻子进村少不了抢东西，如果他们把家里的畜禽搜罗去，那算白养了；如果他们没瞧见，不捉走，咱们就又捡着了。急忙张罗好这些事以后，又锁好家门，你爷爷担着筐子，我拉着你爹，急急忙忙随着人流跑出村东口。走出一里多路，天就黑了。小鼻子真的进村了！鬼子进村不见人影，听到村子东面有动静，知道乡亲们往东跑了，便向东面放了一排子枪。子弹 嗖地响。我拉着你爹跟着你爷爷拼命向东山沟跑。快要到东山沟时，你爷爷说他的左手发软，还粘粘糊糊的。划根火柴一看，可把我吓坏了你爷爷的左手滴了很多血，手背被枪弹穿了一条沟。我从筐子里拿出1件单衣撕成布条，把你爷爷的伤手包好勒紧。剩下的衣服片子又塞这筐里。这时发现筐上有了子弹洞，筐里有双我出嫁时做的新绣花鞋，也叫子弹穿了个圆窟窿。看看你爷爷的伤手，掂掂这双出嫁时陪送的新鞋，心里又疼又恨。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啊！”

讲到这里，我听得出神，眼睛紧紧盯在老祖母庄严和带有怒色的面孔，我的小手攥紧了拳头，我的咀嚼得紧紧的，还咬了咬牙。

老祖母还讲道：“那时人们都说，‘大鼻子蠢，小鼻子

奸，大鼻子斗不过小鼻子。’没过多久，日本鬼子打胜了，俄国打败了。南满退走了大鼻子，来了更坏的小鼻子。日本鬼子夺了旅顺口，占了南满铁路，他们随便毁坏庄稼，强占良田，打骂老百姓。他们欺负人，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、撒尿啊！……

老祖母讲的故事富有浓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。她讲的是那样的生动感人，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深深埋上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。我从小就知道了祖辈们深受帝国主义的残害，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帝俄和日寇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，日本帝国主义则更奸诈、更凶恶、更残暴。

后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见识的增多，我心中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。1929年我开始读高小，学校在熊岳城南5里的正黄旗村。因离家校远，我住校学习。每周回家背点粮都要经过熊岳城火车站。这个车站和车站附近土地为日本霸占，发生了事情，中国政府无权过问，因而人们称这个车站为“日本车站”。车站附近有两块肥沃土地十分引人注目。一块在车站东面，是日本人经营的农业试验场；另一块在车站西面，是日本人经营的苹果园。这两块地年年向外扩张，四周农民的耕地逐年被蚕食。日本人以少量的钱强征地权，甚至分文不给就将农民的土地掠去。农民向中国政府申冤，官府无人过问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每当我耳闻目睹日本人的霸道，心中总是愤愤不平。

学校放暑假，我约几个要好的小同学，来到火车站东一条大河边的温泉洗澡。不料温泉水最旺盛的地方，都被日本人占据了。他们修建了简易游泳池，将温泉水引入池内，池四周还建起许多简易木板房为日本人洗澡专用，

中国人不许入内。我们几个儿童来到游泳池边，只见池内水清澈透底，还冒着热气，此时池中空无一人，于是我们就悄悄跳进游泳池游起来了，边游边戏水，好不快活。正当我们尽情畅游的时候，被火车站的巡捕发现了。这小子大声吼叫着，直奔我们这边走来。他满脸横肉，瞪着眼睛撅着咀，嘶着嗓子嚷道：“你们这些顽童大胆妄为，竟敢在日本人的游泳池里游泳，我非把你们几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带到巡捕房不可！”我们几个小同学见势不妙，抓起自己的衣裤，机警地跑掉了，巡捕穿的是高筒硬靴，追了几步，象笨猪似的。他见我们跑远了，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巡捕房去了。我们几个小同学脱险后，一边走一边议论这条走狗，骂他投靠日本，认贼作父，狐假虎威。

提起这个巡捕，老百姓对他无不恨得咬牙切齿。这个巡捕姓姜，人们称他姜二鬼子，绰号叫姜扒皮。他身穿黄呢子制服，头戴红帽子，斜挎一口长刀，腰系王八盒子（日本造的手枪）和捆人的绳索。他经常出现在车站站台、票房和车站附近的路口上，进行敲诈勒索。凡是在车站附近做小买卖的，拉车的，都得向他“进贡”，否则他就要找岔，叫你无法生活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到姜二鬼子用皮鞭抽打一个马车夫。马车上客人已经坐满了，姜二鬼子硬要把他的一个熟人塞在车上，马车夫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，便遭到他一阵毒打，被打得皮破血流。姜二鬼子、姜扒皮是我们的民族败类。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借助这伙败类，把侵略的魔爪逐渐深入我们国土的。

1930年的秋天，高粱、谷子熟了，乡亲们即将开镰收割庄稼，突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联队，开到我们家乡一带

进行战术演习。老百姓称之为“打秋操”。关东军大队人马散在庄稼地里，乱踏乱踩了两三天，好端端地成熟了的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棉花、花生被踩的东倒西歪。大面积的庄稼象暴风雨打过的一样，零乱不堪，好不凄惨。老乡们叫苦不迭，只好含着眼泪忍受这意外的严重灾难。

1931年我升入盖平县立初中读书。这一年的9月19日上午，正当胡彦儒老师给我班同学讲数学课时，我们突然发现教室北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小分队的士兵，手提轻机枪和步枪向学校这个方向走来。开始时距离较远，分辨不清是什么军队。待走近些时，大家吃了一惊。啊，原来是一群日本士兵。他们荷枪实弹，刺刀上在枪上闪闪发光，列成战斗队形，向我们学校的教室大楼逼近。我还以为日本军队又在“打秋操”呢，但越看越不象。只见这一小队日本士兵在一名军官的指挥刀挥动下，很快从我们的教室旁边掠过，直扑学校大门外的土岗上，包围了位于土岗上的县警察局迫击炮队的营房。接着，一阵斥骂和喊叫的声音从营房传出来，听了令人寒慄。我们正在惊愕纳闷时，忽然有两名中国士兵从营房跑出来，头部和面颊流着鲜血，一面嚎啕地哭叫着，一面向西南方向逃去。随后迫击炮队的营房被封锁起来，日本小分队站上岗，又放上游动哨兵，阻止任何人接近营房。第二天，消息传开了，日本小分队以武力攻占营房，迫使县警察局迫击炮队全部缴械。迫击炮队的队长当时外出不在营房，值班排长拒绝缴械，日本兵就用刺刀将这个排长捅死，营房里的中国士兵遭到鬼子的毒打，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血肉模糊，有的丢下武器不顾一切地逃命。营房里的武器、弹药、给养、被服都变成了日本

小分队的战利品。

日本小分队占领了迫击炮队营房后，又把我们学校的大门封锁起来，不准任何人进出。这究竟出了什么事？谁也不知道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谁也不清楚。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，封锁校门口的日本兵才撤走。但是晚上他们是否还回来继续封锁校门？谁也猜不透。正当一串疑团迷惑不解时，学校传达室的老“传达”出现在同学面前了。他平时传达什么事情都摇铃，这回却没有摇铃。他小心翼翼地轻声地告诉同学们：“马上到校长办公室前面小广场集合，李校长有重要事情向大家讲”。我想一定有重要消息了，便情不自禁地一路小跑到会场。须臾老师和同学们都到齐了，校长李郁青站在办公室前的石阶上，表现有些神态不安的样子，他开始面向老师和同学们讲话：“看来时局发生了变化。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甚清楚。我给县教育局打电话，电话要不通。还给县长辛广瑞打电话也打不通，警察局长高学本的电话同样地不通。我派人去城里打听，结果，盖平县城被日本兵把守着，禁止通行。听说南满铁路火车也不通了，只有日本的军车不停地运行，满车载着日本关东军。还听说县城里警察局、分所的枪支通通叫日本兵收缴了，有的中国士兵被他们打死了。辛县长、高局长和县公署的其他负责人去向如何，人们说不清楚。城里做买卖的都关门了，街上冷冷清清，老百姓惊恐不安，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。有的人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有行动，到底是什么行动眼下还摸不透。根据上述情况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暂时停课放假。你们先回家复习功课，等局势稳定了，再通知同学们回校。你

们回家前可以把行李放在学校的仓库里，由学校统一保管，你们离校回家不要通过县城，免得惹出麻烦来。一路上不要走大路，尽量走小路，以免与日本兵相遇，如果遇到日本兵盘问你们时，就说自己是农民，下地干活的。”

我听完李校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讲话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临头，再也不能安然读书了。这样的灾难是民族的灾难，看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回想老师曾向同学们讲过：原日本首相田中曾经向日本天皇呈递奏折，所谓“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”想起这些，令人震惊，并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三省的计划已付诸实施了！

晚上我躺在炕上，联想一天的见闻，悲感云集，义愤填膺。痛恨日本鬼子凶残霸道，蛮横无理，钦佩迫击炮队排长拒降而死，不愧为有民族气节的中国军人；轻蔑那些软骨头的官老爷，什么县长、局长等等，临难而逃，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强盗。一夜之间我辗转反侧，说什么也睡不着，有时只听得远处阵阵狗吠声，伴随着秋夜不眠的唧唧虫的哀鸣声。夜里得是那样地长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东方破晓。

清晨，我和六、七名家乡的同学一起动身回家。阳光透过迷雾洒射在我们行进的道路，潇潇秋风吹拂着我们的衣襟。我们穿过学校门前的一片树林，抄小道蹑足潜行，顷刻间来到县城南一条大河的岸边。我们在河岸上稍坐，望着湍急的河水，盘算怎样渡河。一位水性较好的同学，脱掉衣服探水，发现河水不深，中流之处，仅过肚

脐。于是大家手挽手淌水过河。行至河心，激流冲击着我们摇晃的身体。同学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，好象结成了一条铁索，终于胜利地渡过了大河。一位同学形象地说：

“在这多难之秋，我们是同舟共济啊！”渡过河后，大家的情绪较前活跃了一些。同学们一边谈笑一边整理衣裤。准备停当，便沿着小道赶路。走了一段里程，又交叉到大路上，我们举眼向四周瞭望，见大路上既无车辆又无行人，便舍小道顺大路行走。大路两旁的高粱、玉米、谷子、大豆都已黄熟，但尚未开镰收割。这时，同学们觉得十分饥饿。因为早上出发前都没有顾得及吃东西。空肠辘辘，在荒郊野外找些什么吃呢？一位同学说：“烧玉米。”我们从地里摘回十来个鲜嫩的玉米，拾了一捆干草和杆秸，划根火柴烧了起来。烧熟了的鲜嫩玉米又香又甜，有说不出的一番美味。这也许是特别饿的缘故？

吃饱了肚子，同学们的劲头更足了，一口气跑回各自的家中。我一踏入家门，全家都有些发愣。父亲问我为什么离校回来，我说明来由后，家里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老祖母说，学校让学生回家也好，城里乱，你回家免得大人为你操心。

不久，日本关东军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和侵占东北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，也传到农村各个角落。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传说：什么“日本鬼子攻占沈阳时，沈阳北大营王以哲的军队一枪未发就跑掉了”；什么“马占山的队伍同日本军队打了一仗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，灭了鬼子的威风”；什么“鬼子在沈阳北柳条沟杀害了很多老百姓，在沈阳市还抓了不少中国人关到大狱里头”；……。我家里

长辈们听到这些传说后，主张把我留在家里，不再去城里读书。认为世道乱了，天下不太平，出去读书不如在家种地。后来又有传说，说日本人到处抓青年学生，要学生们到日本国当劳工。家里听到这样的传说又有点紧张了，认为把我留在家里也并不安全。我在县城读初中，村里的人都知道。家长特别担心的是村里有日本人的狗腿子王宣，他可能会告密。乡亲们都痛恨这个王宣，称他为“王坏”。这个坏蛋偷摸拐骗什么都干，他一生坏事做绝，罪恶累累，因而后来在土改中被翻身农民打死了。

家里长辈们都为我发愁，送我回城读书不放心；留我在家种地觉得也有危险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：既不回校读书，也不在家种田。我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，我决心不当亡国奴！

仇恨日寇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，但如何摆脱日本人的统治，却想不出什么门道来。就在我愁眉不展的当儿，我的同班同学小朱来到我的家中，与我商量能否一同进关内求学。他哥哥是东北军何柱国骑兵三师的一名军医官，在山海关内不远的抚宁县驻防。他哥哥来信说北平、天津一带有公费学校，他可以托人办理入校手续，希望小朱接信后前来进校学习。信中还说，为避免只身行动不便，最好能约一个靠得住的要好同学前往。小朱向我介绍了这些情况后，随即掏出他哥哥的来信给我看，并对我说：“咱们是同窗好友，很知己，接信后我首先想到的是约你同往关内，我想你会同意的。”我当即表示愿意同往，以免在东北当亡国奴。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父母和祖母，他们认为随小朱到关

内上学倒是一个机会，不过路途遥远，年纪又小，担心我到关内，离乡背井，无依无靠。我发现长辈们顾虑较多，便抓紧时间多方了解情况。我到外祖母家，了解她家的邻居陈克增在关内求学的近况。陈克增是我高小的同学，比我高一级。他进关到北平东北中学，上的是公费学校，吃饭穿衣都有保证。证明了小朱哥哥来信谈的情况是确实的。我又专程去柳叶屯村，到老赵家询问情况。得知他家有个儿子叫赵春澄，也在北平读书，上的是公费学校东北中学，吃穿和学习书籍用具都由学校供给。我把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一一向家中讲述，父母亲觉得不错，同意我随同小朱同学去关内，通过他哥哥托人介绍进东北中学读书。父母亲说：“九一八”事变好几个月了，日本人管得越来越紧，对中国老百姓不当人看，到北平入东北中学也好，呆在东北没有奔头。可是进关后人生地不熟，要处处留神，学会自己照料自己，有机会就捎信来，免得老奶奶心焦。

全家都同意我去关内，只有老祖母闷闷不乐。她平时十分疼爱我，听说我即将离家，觉得难高难舍。经我再三安慰、说服她，她表示：“你不愿在鬼子管辖下当亡国奴，我也不好再留你，等把鬼子赶跑了，你就马上回来看我。”

时光不断地流逝。我和小朱同学说服了家庭父老，做好了临行前的一切准备后，已经是1932年的夏季了。我们离开家的那天，家里的人都含着眼泪送我。我哥哥担着我的行装走在前面，年近七十的老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随我缓慢地行走，父母亲紧挨着老祖母同行。老祖母流着泪对

我说：“这回你走后谁知啥时候回来？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！”说着说着，哽咽起来。我只觉得一阵心酸，随之两颊也沾满了泪水。这种国难当头生离死别的场面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而且无法用语言、文字去形容。老祖母拖着沉重的脚和蹒跚的步子送了我两里多路，经我再三劝说，她才转回身去，在我母亲的搀扶下，默默地回家去了。我别离祖母后，父兄继续送我到车站。十八年后，日本已投降，国民党也溃败，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回到故乡，老祖母已离开人世三年了。回忆与老祖母生离死别的情景，甚感怅惘，心情很不平静。老祖母爱祖国、爱家乡、爱子孙，是一个纯朴、正义和善良的女性。

我和小朱同学在熊岳车站会面后，即购买火车票，告别送行的亲人们，登车北行。火车隆隆地响，从车窗向外望去，铁路两旁庄稼稀疏，阡陌乱草横生。天空布满了密云，开始下起来蒙蒙的细雨。我触景生情，感叹不已：祖国茫茫大地，在日寇的蹂躏之下，竟变得如此死气沉沉！我们此去关内前程如何？何时重返故乡，喜庆胜利之日？……真是茫然不知，思绪万千。在这种心情下，一路上我和小朱谈话不多，与就近偃坐的旅客们也很少答腔，整个车厢里也是同样沉静的，因此铁轮与钢轨的摩擦声显得特别响。就这样熬过四五个小时，火车到达了沈阳车站。

我和小朱走出车站后，打听到我本家的侄儿张保禄。他在沈阳车站当副站长。找到他以后，他把我们接到家里。他向我们介绍说：“从沈阳到山海关还通车，不过日本已经控制了锦州，来往旅客凡经过锦州车站，日本兵都

要详细盘问和检查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俩年纪小，不引人注意，通过锦州估计问题不大。如果遇到日本兵盘问，你们就说是走亲戚的。你们上车后，我还可以给车长和列车员打个招呼，让他们一路照料你们。”随后张保禄又帮我们买了火车票，开车前又送我们上车，还给我们找了座位，并找到车长，托他们沿途照顾我们。

火车鸣了两声长笛，便徐徐开动了。我们从车窗伸出手来向站在站台上的张保禄致意，张保禄也挥手向我们送别。火车加速后，铁路旁的电杆和树木飞快地向反方向掠过。我远望辽阔的大地，肥沃的田野，青山绿水，联想驻守东北的主力军队不战而退，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千里江山，感到非常气愤。常言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”为什么不抵抗日寇侵略，便将中国军队撤退关内？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是迷惑不解的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在思考着它的答案。

火车驶进了锦州站。站台上站着约有一个小分队的日本兵，个个枪上刺刀，全付武装。他们如临大敌，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车厢。列车刚刚停稳，他们便分别闯进每节车厢，检查行李，盘问旅客。有的日本兵能够生硬地讲几句中国话；有的手中拿着白粉笔，强令旅客打开自己的行李包，如果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，就在行李上画一个白圈；如果认为可疑，则打一个十叉，而后强令下车再做详细盘查。一个日本兵走近我和小朱跟前说：“你们小孩，什么干活计？”我说：“我们走亲戚”。他翻了翻我们随身带的衣物，而后分别在我俩的行李上画了白圈，接着便检查其他旅客去了。这时我的心象一块沉重的石头落

了地，不象刚才那样紧张了。客车在锦州站停留有两个半小时。当时正值中午前后，夏日的阳光直射车厢，我们象在蒸笼里一样，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大家都恨日本鬼子们挨个盘查，不让列车开动。直到他们完成搜查任务离开车厢，车站值班的才挥舞绿旗，给列车放行。火车开出锦州站，如同过了鬼门关，车厢里的人们松了口气，开始谈笑风生起来了。当时锦州以南，日本军尚未正式占领，人们认为还可以呼吸一点自由空气，所以过锦州后车厢里呈现了一路上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。

大约午后四点来钟，我们抵达山海关车站。我们带上行李匆匆地走出车站，看到一队队的中国士兵正在空地上操练。我离开了故乡，曾有依依不舍之情，可这时又象从异国还乡，喜庆回到了自由的中国土地。我看到中国士兵的面孔，似乎觉得熟悉、亲切，这可能是几个月来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所产生的特殊情感。我希望中国士兵操练有素，奋起抗日。在山海关我看到了渴望已久的万里长城，它蜿蜒起伏，宏伟壮观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威严，记载了数千年抵禁外敌入侵的历史。我们走出山海关的瓮城，在高大的城门楼上，悬挂一块大匾，上写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大字。当地人传说是明朝大宦官严嵩的手迹，但也有人说是其他大书法家写的。我们无心考证这些事情，只顾赶路去抚宁县找小朱的哥哥。抚宁县城距山海关还有几十里路，我们雇了一辆拉脚的驴车，载着我们俩和行李，一路小跑，于黄昏时分来到抚宁县城，见到小朱的哥哥。

朱军医官见到我们非常高兴。他说“接到信说你们要来，这几天我老是惦念着路上会不会出事，你们终于平安